

土耳其研究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黄维民

摘 要: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关键词: 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正义与发展党;民主政治;土耳其外交

作者简介: 黄维民,博士,西京学院教授(西安 71012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5-0077-14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开始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变革精神构成了该国现代化转型的优势因素,使其有能力在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①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土耳其能够适应并擅于利用悠久历史传统和地缘位置等各种因素,而非仅仅通过抛弃历史传统来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使土耳其有能力应对全球体系变革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断推进现代化转型。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内涵、逻辑和历史因素,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转型必将是一个曲折坎坷,但又充满活力和具有神奇色彩的历史发展过程。

^① Ahmet Davutoğlu, "The Restoration of Turkey: Strong Democracy, Dynamic Economy, and Active Diplomacy," *Vision Papers*, No.7, 2014,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 12.

一、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演进与逻辑

考察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演进,首先需要深刻理解土耳其的现代化理念与定位。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经历了大范围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转型,有学者将该时期的现代化转型视作历史上“坦齐马特改革”^①后土耳其最重要的民族复兴举措。^②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推行过数次现代化转型,“坦齐马特改革”后,土耳其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关键性的现代化转型。许多从事土耳其研究的专家学者将 2000 年以来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视作第四次现代化转型。有学者指出,土耳其第四次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理念,体现在“抓住时代精神”和反对一切教条的政治态度上。“抓住时代精神”的现代化理念,在土耳其不同时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无论是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时期、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时期、二战后两极格局形成时期,还是当前中东地区所处的剧变时期,土耳其一直不乏现代化变革诉求。^③土耳其的现代化变革诉求,既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也是为了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

当代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现代化转型,为其在全球体系变革中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奠定了基础并提供可能。稳固发展的民主和充满活力的经济,构成了土耳其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先决条件与发展逻辑。土耳其在制定现代化转型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一直将政治、经济与外交作为政策制定与调整的优先领域,并强调通过综合施策来推进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对土耳其而言,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取决于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因此,避免在政治、经济与外交三大领域出现阻碍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消极因素,便成为土耳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涵与关键所在。

“坦齐马特改革”、“凯末尔领导的世俗化改革”以及“二战后实行民主政治变革”是土耳其近代历史上的三次重要现代化转型。^④每一次现代化转型,人们都可视作土耳其为适应全球体系变革而作出的努力,并且都是在经历国内重大政治斗争后得以实现的。近代以来,国际格局不断调整,土耳其社会精英提出土应保持与时代

^① “坦齐马特”在土耳其语中意为“改革”。“坦齐马特改革”是至 19 世纪中叶土耳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改革派为巩固奥斯曼帝国统治而推行的改革运动。1839 年 11 月,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颁布著名的“花厅御诏”,揭开了“坦齐马特改革”的序幕。

^② [土耳其]阿尔泰·古尔汗:《共和国早期改革的特征分析》(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 年 11 月 19 日,第 5 版。

^③ Ahmet Davutoğlu, “The Restoration of Turkey: Strong Democracy, Dynamic Economy, and Active Diplomacy,” p. 38.

^④ Ibid., p. 26.

发展一致的步伐,努力适应现代化发展,推进现代化转型。在“坦齐马特改革”时期,土耳其精英分子将法国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新术语、新概念引入土耳其社会发展的语境中,努力使本土的传统政治概念同外来的政治新术语实现融合与对接。例如,“祖国”一词就被土耳其文学所接受,就是外来政治术语和相关概念融入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例证。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地方性选举过程中,伴随社会改革而出现的消防部门、邮政系统等社会组织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虽然这些机构的形式、内涵和功能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但国家还是尽最大努力维持其社会存在。当然,有些制度会随着时代发展和急剧变化而遭淘汰或被替代。^①

纵观 19 世纪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土耳其总是围绕努力融入欧洲体系制定外交政策,并服务于现代化转型。土耳其 1873 年参加维也纳“专利改革”会议、1883 年 3 月 20 日签署《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Paris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Property)、颁布“花厅御诏”(Edict of Gülhane)等外交行为,均是土耳其为融入当时国际体系和适应国际格局变化所作出的外交努力。同时,土耳其通过转变政治制度、提升军事技术、引入政治新术语等手段^②实现了早期现代化转型。这些行为的发生,得益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及其催生的社会发展动力。自此,两条互相分离的社会发展脉络开始逐渐在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浮现出来,即主张坚守传统价值的道路和主张进行现代化改革的道路并行发展。在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新奥斯曼人持之以恒、决不后退的斗争精神随处可见,直至今日依然深深扎根于土耳其的社会中。

1839 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麦吉德颁布“花厅御诏”,标志着“坦齐马特改革”的开始。自此,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军事、司法、行政、教育和社会等领域推进全方位改革,努力保持奥斯曼帝国政治结构的多样化,顺应国际体系转型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土耳其开始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推进现代化转型。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是一段饱含创伤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同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等多民族帝国都面临类似的体制挑战,这种挑战不同于法兰西、英格兰等单一民族的帝国。当多民族自然聚居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帝国时,帝国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对帝国内多民族的控制,如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是帝国瓦解后土耳其民族追求现代化的结果,不仅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经历了重要调整,整个国家和各民族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也是一种现代化转型,这为土耳其从

^① Ahmet Davutoğlu, “Global Governance,” *Vision Papers*, No. 2, 2012,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p. 26,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2/03/vision_paper_ing_02.pdf, 登录时间:2016 年 3 月 8 日。

^② Ibid., p. 36.

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实现民族经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1950 年 5 月民主党大选获胜后,专门成立了“伊兹密尔经济国会”,指导土耳其民族经济发展,推动土经济体制转型,为土耳其民族经济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从土耳其共和国制定的百年目标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再次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的土耳其并没有抓住新的历史机遇,其采取的行动却如同一个“战败者”,因此许多土耳其问题专家将 20 世纪 90 年代看作是土耳其现代化转型失败的时期。^①

二、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及其动因

自 2002 年正义与发展党(AKP)执政以来,土耳其民主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也加快了“入欧”步伐。2004 年,土耳其与塞浦路斯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为土耳其申请获得欧盟会员国资格扫除了一大障碍。土耳其学者认为,如果土耳其在卷入海湾战争前就开始申请入欧并改善与邻国关系,该国在 2023 年便可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当前的土耳其只实现了其中的部分目标。^②但是,1990 年土耳其出现了一系列制约现代化转型的因素,如没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导致由不同党派组建的短期联合政府内部在利益分配上出现重大分歧等。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多年来一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决策机制,成为导致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迟滞的关键因素。2002 年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经历的现代化转型成为该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推进政治改革,制定具有市场化特点的经济政策,推行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等。在正发党执政的十多年中,土耳其一方面秉持保守的民主理念,通过修宪与制宪、普通法改革、政府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改革、调整文官政府与军队关系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积极的经济政策,发展与巩固国家经济实力,采取更为独立的外交政策,提升土耳其在中东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土耳其在过去十多年间努力推进现代化转型,成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积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适应国际体系转型的典型代表。

当代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坚守历史记忆与民族传统中探寻世俗化道路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相融合的过程。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揭示了这种现代化转型的特征,时刻提醒着生活在小亚细亚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你们既存在于辉煌的历史之中,也将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土耳其的

^① [土耳其]塔伊普·巴萨克图:《后冷战时期土耳其的战略选择》(土耳其文),载土耳其《自由报》2011 年 11 月 16 日,第 3 版。

^② Ahmet Davutoğlu, “Global Governance,” p. 21.

文化并不庸俗与消极,并塑造了一个国家努力寻求现代化转型的积极意愿。”^①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是在激发整个民族迈向现代化意愿的基础上,寻求建立稳固的民主政体,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以及推行积极灵活的外交。自1946年土耳其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多党民主制以来,民主政治已成为现代土耳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此后,土耳其的民主政治经历了包括军事政变在内的多次挑战,并一度受阻。尽管如此,土耳其仍坚持赋予民众投票选举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一方面满足了广大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诉求,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土耳其人民的民主意识,加强了土耳其推行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

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在于反映时代精神的宪法。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执政者和具有改革意识的大臣曾试图将“时代精神”作为正式条文写进著名的“花厅御诏”中。而土耳其共和国召开第一届制宪大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努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20世纪50年代初,土耳其采取了“四重奏行动”:1950年3月,大国民议会一致通过新选举法;同年5月22日,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党魁拜亚尔为土耳其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曼德列斯出任政府总理;曼德列斯组建由14名部长组成的民主党内阁,实现了执政党的和平更替,促进了土耳其民主政治和多党制的建立。

从过去十余年间土耳其的实践来看,道德基础、制度基础、外交政策构成了土耳其现代化转型和巩固民主的三大支柱。

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政府推出多项促进民主政治的社会发展计划,为废止历史上的一些“禁令”作出了巨大努力。首先,土耳其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政策法规,放宽在社会生活领域对伊斯兰教的限制;其次,土政府颁布法令改组军队系统,将军队置于政府掌控之下,逐步结束军人监国的历史;再次,正发党提出“库尔德倡议”,给予库尔德人更多政治权利与自由,以换取库尔德人的支持;最后,土政府大力发展私有化经济,不断降低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比重。打破历史上的“禁令”,极大地提升了正发党政府的公信力,使得具有浓郁伊斯兰情结的土耳其民众对国家归属感与日俱增。有学者指出,如果正发党政府不废除“禁令”,便难以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也难以维持社会和安全平衡,土耳其将会继续以一个反对任何限制民众美好愿望“禁令”的国家而存在。^② 正发党执政期间,道德基础成为正发党领导的历届政府执政的核心理念,并构成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动

^① [土耳其]巴沙克·图尔丹娜:《土耳其文化遗产的政治价值》(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年6月8日,第2版。

^② Tark Oğuzlu,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of the 2.0 Version of Turkey’s ‘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 Policy,” *SAM Papers*, No. 1, 2012, p. 26,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2/02/SAM_Paper_TarikOguzlu2.pdf,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力之一。^①尤其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发党付出了巨大努力,具体表现为执政党重视责任和透明原则,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具有责任担当,为自己的行为和拥有的权利负责,这些措施使正发党执政期间在反腐倡廉方面成效显著。

在发展民主社会的过程中,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是稳固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从制度合法性角度看,如果制度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处于人民的监管之下,那么这种制度便是合法的。对民主制度而言,获得国家权力的过程必须体现合法、公正与客观三大要素,即通过选举等民主机制决定国家的意志,提升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因此,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确保分权与制衡原则的有效运行,能够巩固与深化民主政治,实现各部门权力的平衡与协调,推动国家机构管理的民主化建设,从而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现代化转型。对土耳其而言,民主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两大要素。一方面,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是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开展积极灵活的外交实践的制度性基础,正发党执政以来推行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正是得益于整个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深化。^②另一方面,土耳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活力的提升,反过来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稳定且持续的物质基础,使土耳其赢得了民众及国际社会的尊重。

据统计,2002年土耳其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民众数量占人口比例0.5%~1%之间,日均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约为3%~4%;至2012年,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贫困人口已基本消失,日均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的人口比例也大幅减少。^③国际社会将日均生活费用4美元作为划分贫困群体的标准线,2002年土耳其日均生活费用低于4美元的群体占总口比例的30%,如今这一比例已下降至2.3%。^④

对土耳其而言,如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通过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反馈给社会,那么民主政治的实现便难以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一般认为,当民众的日均生活费用低于4美元时,民主政治便难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国家也无法在国际社会获得他国的尊重并保持较高影响力。当前,土耳其在收入分配上已超过了国际标准,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促进了土耳其经济的良性发展。根据土耳其制定的国家

① Tank Oğuzlu,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of the 2.0 Version of Turkey's '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 Policy," *SAM Papers*, No. 1, 2012, p. 32,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2/02/SAM_Paper_TarikOguzlu2.pdf, 登录时间:2015年12月20日。

② "Turkish-Greek Engagement in Middle East and Balkans Tunisian Election Observation," in *SAM Annual Report*, No. 11, 2013,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Republic of Turke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 18,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1/12/Annual_Report_2011.pdf, 登录时间:2015年7月19日。

③ 黄维民:《土耳其史话》,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④ [土耳其]穆斯塔法·法鲁克:《土耳其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3年9月16日,第4版。

发展计划,日均生活费用低于4美元的群体将在未来几年中消失。^①因此,在正发党执政的十多年里,土耳其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使“土耳其模式”成为中东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

十多年前,土耳其尚处于必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的阶段。如今,土耳其已成为对该组织贡献超过50亿美元的重要成员国。^②在过去十多年间,土耳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高达每年8,000亿美元;国际购买力已超过1万亿美元;人均年收入增加了3.5%,达10,500美元。据2013年世界银行的预计,土耳其人均年收入将会在不远的将来突破17,000美元。^③近年来,土耳其年均对外贸易额已达4,000亿美元,其中对外贸易出口额达1,500亿美元,跨境投资达1,300亿美元。^④上述数字反映了近年来土耳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及其巨大活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复苏呈现疲软态势,欧洲地区的经济脆弱性进一步凸显。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成功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危机和考验,尤其在经济上抵御住了因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许多观察家曾经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悲观估计,认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土耳其经济增长的态势难以维持数月。然而,在过去十多年间,土耳其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当今经济发展的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复现古代文明中经济因素,如强调“丝绸之路”等古代文明因素对当今经济发展的精神引领作用。第二,将高科技手段作为整合全球经济的工具,使其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具有奥斯曼帝国情结的土耳其,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土耳其试图将具有西方特征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同具有古代传统的文明底蕴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将自身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有经济发展活力的国家之一。目前,土耳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是在加大对亚洲和非洲地区经济交往的基础上,为本国的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⑤土耳其在经济上对亚非地区的重视和“主动出击”,不应被简单地视作“第三世界主义”。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如果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中国和印度等欧亚大陆主要经济实体间划一条线,土耳其正好不在此范围

① [土耳其]雷杰普·杰比尔齐:《土耳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特征》(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年2月26日,第2版。

② [土耳其]杰马勒·克古齐:《土耳其与国际组织的经贸往来》(土耳其文),载土耳其《自由报》2014年5月12日,第3版。

③ [土耳其]费斯·耶尔塔米:《中东地区的贸易发展趋势》(土耳其文),载土耳其《自由报》2015年1月28日,第2版。

④ “Turkish-Greek Engagement in Middle East and Balkans Tunisian Election Observation,” p. 36.

⑤ Anders Fogh Rasmussen, “NATO and Turkey: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Perceptions*, Vol. 17, No.1, 2012, p. 29.

内。但是,欧亚板块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基地,其经济地域始终对土耳其具有开放性,这也是土耳其制定宽松签证政策的原因所在。放宽对欧亚板块主要经济体国家的签证政策,不仅能为土耳其带来大量的游客,也能鼓励更多的人力资源、技术人员和资金涌入土耳其,实现优质经济要素的有机整合。例如,2010年6月10日,第五届土耳其—阿拉伯经济论坛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四国在论坛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四国计划建立自由贸易区,密切经贸往来,彼此间逐步实现签证互免,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并组建“高级合作委员会”以落实该项计划。这些举措的背后隐含着土耳其更宏大的经济战略意图,即依靠中东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联系,早日融入欧盟这一毗邻的重要经济体和国际经济舞台。

灵活多变的外交构成了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第三大支柱。在当前充满变数的国际社会,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既是一国顺应形势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路径。近年来,在局势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土耳其外交政策具有高度灵活性。土耳其强调“人道主义”的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构成了其外交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哲学基础。^①“人道主义”因而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最具特色的外交理念之一。土耳其认为,在7,500万土耳其公民中,每一个人创造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能否自由行动存在重要关联。土耳其正是依照这一逻辑在对外交往中强调“人”的理念,探索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顺应时代发展的有效路径,在中东地区推行独具特色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在与西方国家夯实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平衡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基于共同的伊斯兰文化发展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总之,维护与强调人的尊严构成了土耳其外交政策和政治立场的核心,并成为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进行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但有学者指出,正发党执政的十余年间,土耳其外交因未恪守“人”的理念导致其外交政策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和创新。^②事实上,土耳其过去在索马里、缅甸、巴勒斯坦问题上,一直在调解国际冲突中倡导人道主义的理念,为国际和平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三、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其内因

强调对人类尊严的捍卫和保护,构成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过去十多年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总是围绕这一价值观基础进行调整和转变。土耳其外交

^① Mehmet Özkan, “Turkey’s ‘New’ Engagements in Africa and Asia: Scope,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Perceptions*, Vol.16, No. 3, 2011, p. 31.

^② [土耳其]叶不茹·美尔图:《近年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年12月29日,第4版。

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并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制定面向欧盟和跨大西洋地区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话语权。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为面向欧盟和跨大西洋地区,加强与该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土耳其外向型经济的全面发展。当前,土耳其国内正在经历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些变革也促使正发党在外交政策上高度重视欧洲地区,这取决于土耳其特定的历史和地缘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土耳其位于欧亚交界处,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导致土耳其的身份时常在欧洲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摇摆。有学者指出,土耳其是一个位于中东地区的欧洲国家,也是中东历史的一部分。^①不同于其他中东国家将欧洲看作另外一个世界,土耳其常将自身历史视作欧洲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二元身份植根于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因此,土耳其将这种二元身份同其区位优势相结合,在欧洲事务和中东事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对外交往中呈现出一种将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相结合的土耳其风格。

通过长期而艰苦的谈判,欧盟委员会曾于2013年5月4日表示将对土耳其放宽签证。随后,土耳其政府决定放开对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签证要求。土耳其对欧盟成员国实行免签,成为近年来土耳其外交的重大成就。尽管塞浦路斯问题仍是欧盟接纳土耳其的重要阻碍因素,但土耳其仍致力于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相关协议,为其入欧扫清障碍。土耳其在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其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外交立场:“土耳其方面将继续采取具有前瞻性的措施为塞浦路斯问题的最终解决付出巨大努力。”^②与此同时,土耳其将继续发展同北约的关系,尤其是希望早日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不断强调支持对“跨大西洋经济伙伴”的立场,以稳固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其与美国的关系不仅影响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也是欧盟同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变量。

第二,不断改善与邻国和大国关系,努力为本国现代化转型提供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同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关系不断受到土耳其与邻国关系和地区局势的挑战,土耳其与希腊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纠纷、土耳其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伊朗核问题、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对土耳其同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积极同邻国和大国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特别是与重要邻国俄罗斯

^① Mehmet Özkan, “Turkey’s ‘New’ Engagements in Africa and Asia: Scope,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p. 33.

^② [土耳其]阿尤布·宾努殊尔:《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发展现状》(土耳其文),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年11月26日,第5版。

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游而不离的关系。2004 年之前,俄罗斯领导人从未访问过土耳其。此后,两国领导人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互访。过去几年间,土耳其与俄罗斯等国组建了“高级战略委员会”,通过召开“联合内阁会议”促进多边合作,使土耳其的对外贸易额不断增加。^①此外,土耳其恢复了同邻国希腊的全面合作关系,通过改善地区环境促进土耳其的对外交往。在历史上,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龃龉不断,两国均采取了敌视与保守的外交立场,突出表现为当希腊成为某一国际组织的候选国时,土耳其就会坚决反对,反之亦然。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与希腊签订的协议数量仅 35 项。随着土希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两国间的互通与交流逐渐增多,政治互信也稳步提升。过去数年间,仅在“高级战略委员会”的两次会议中,土耳其就同希腊签订了近 50 项协议。双方互信的不断提升促成了“地中海—爱琴海”区域新秩序的建立。^②实际上,近年来土耳其依托“高级战略委员会”,同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埃及等国的贸易额增长了近十倍。2002 年,土耳其同 13 个邻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 130 亿美元,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 1,000 亿美元。^③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耳其推行的“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通过发展与邻国友好关系和加强全面合作交流,为土耳其实现现代化转型创造有利的地区环境。土耳其与周边邻国全面的合作交流,也反映出土耳其对地缘政治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包括坚持温和的伊斯兰发展模式,与周边国家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灵活多变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地区冲突上扮演调停者角色等。

在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当下,处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结合部的土耳其正面临欧洲和中东地区秩序调整的双重影响,并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始终处于大国地缘博弈的中心。“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试图通过高调介入中东事务主导阿拉伯世界的秩序重建,借此向转型阿拉伯国家推销“土耳其模式”和温和伊斯兰发展道路,突出表现在土耳其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土耳其试图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中东事务,一方面,土耳其借机向阿拉伯国家兜售民主价值观以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民主转型。埃尔多安政府支持阿拉伯国家所谓的民主变革,强调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关键不在于强权,而在于人类的尊严、人道主义、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土耳其擅于把握地区政治的现实性,在立场选择上避免脱离地区政治的现实,^④这反映出土耳其外交政策兼具道德基础和理性原则的特征。

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国家积极适应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为

^① Mehmet Özkan, “Turkey’s ‘New’ Engagements in Africa and Asia: Scope, Content and Implications,” p. 36.

^② David Barchard, “Turkey: After the Ankara Massacre,” *Middle East Eye*, October 12, 2015, <http://www.middleeasteye.net/columns/turkey-after-ankara-massacre-1038025422>, 登录时间:2016 年 3 月 7 日。

^③ Anders Fogh Rasmussen, “NATO and Turkey: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p. 19.

^④ *Ibid.*, p. 35.

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在与中东国家密切关系的同时,近年来土耳其也积极开拓大周边外交,尤其体现在土耳其增加了对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国家的外交投入。^① 2009年,土耳其同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成立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旨在加强四国议会间的交流,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对高加索地区与中亚地区外交作出重大调整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于2015年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共同建设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该项目将阿塞拜疆里海天然气经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输送到欧洲国家,天然气管道建设预计耗资100多亿美元,并于2018年年底完成,^②这一计划反映了土耳其基于民族血缘纽带拓展与高加索地区与中亚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

第三,不断开拓外交新领域,积极发展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土耳其经济结构现代转型创造条件。近年来,土耳其积极发展同非洲、拉丁美洲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扩大经贸往来,努力拓展经济外交的新领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土耳其一直坚持“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其与第三世界的交往处于低位水平。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对国家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将自身定位成“跨欧亚非国家”。这种定位体现了土耳其的大国雄心,尤其表现为对历史上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难以割舍的历史情结。近年来,土耳其对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表现出极高的兴趣和积极性。2014年1月,土耳其政府召集非洲国家常驻土国代表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首脑齐聚首都安卡拉进行友好会晤。2009年,只有10个非洲国家在安卡拉设立了大使馆,如今,已有27个非洲国家在土耳其设立了大使馆。与此同时,土耳其已在非洲35个国家设立了大使馆,同非洲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贸易往来,土耳其已成为在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③

土耳其近年来在非洲频繁设立大使馆,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提升土耳其在非洲大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今后土耳其进一步参与非洲大陆的开发提前做好准备。土耳其将非洲视为将在21世纪崛起的新大陆,强调必须提前采取积极行动,才能为将来在非洲获得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发展土耳其同非洲国家的传统友谊,为拓展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奠定民意基础,深化互利合作。土耳其在厄立特里亚开设大使馆时,当地政府曾表示:“其他国家都在关闭驻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而你们(土耳其)却在厄立特里亚开设大使馆,这让我们

^① Ahmet Davutoğlu, “The Restoration of Turkey: Strong Democracy, Dynamic Economy, and Active Diplomacy,” p. 37.

^② 郑金发、邹乐:《土格阿三国开始修建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18/c_1114673355.htm, 登录时间:2016年1月8日。

^③ Ahmet Davutoğlu, “The Restoration of Turkey: Strong Democracy, Dynamic Economy, and Active Diplomacy,” p. 27.

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抛弃。”^①

早在 1990 年,土耳其便试图拓展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外交,但因限于当时土耳其自身经济实力而未获成功。如今,土耳其的经济实力较以往均有大幅提升,国力的日益强盛使得土耳其在外交上较过去显得更加自信。数年前,土耳其在埃塞俄比亚仅有一家商贸公司和 3,500 万美元的投资。如今,在整个非洲地区,土耳其已开设了 341 家贸易公司,并注入了 50 多亿美元的投资。土耳其航空公司在非洲有 38 个目的地,在非洲地区排名第二。^②此外,土耳其对该国驻非洲地区所有的商贸机构进行了整合,以进一步实施土耳其的非洲发展战略。2003 年 10 月,上台不久的正发党政府制定了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发展战略,宣布 2005 年为“非洲年”,要求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将其纳入国家官方外交战略框架下,通过官民结合、全面动员、软实力先行等措施,促进土耳其与非洲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拓展土耳其在非洲的经济外交。至 2014 年,土非双边贸易额突破 230 亿美元,土耳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额较 2000 年提升了十倍。2016 年 2 月 28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科特迪瓦并出席“第二届土科经济论坛”,旨在进一步发展土耳其与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成员国的经贸关系,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自 2009 年以来,土耳其积极拓展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2009 年,智利与土耳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成为第一个与土耳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拉丁美洲国家,预计 2017 年土智双边贸易额将达 10 亿美元。2016 年 2 月 1 日,埃尔多安先后访问了智利、秘鲁以及厄瓜多尔三个拉美国家。随行的土经济部长埃利塔什艾表示,当前土耳其与拉美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已超过 80 亿美元,至 2023 年土耳其建国 100 周年时将达到 200 亿美元。与此同时,土耳其将加快与秘鲁和厄瓜多尔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③

近年来,土耳其十分重视与亚洲国家发展关系,尤其重视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2009 年 6 月 24 日至 29 日,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访问中国;2015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中国,旨在为土耳其开拓亚太地区市场,随行的 100 多名土耳其商界人士同埃尔多安共同出席了“中国—土耳其经贸论坛”,表明中国在土耳其外交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自 2012 年以来,中土双边贸易额已连续 3 年突破 200 亿美元,2014 年达 230.18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

① [土耳其]杰拉尔·艾德尔:《土耳其与非洲关系述评》(土耳其),载土耳其《自由报》2014 年 12 月 16 日,第 4 版。

② [土耳其]欧尔坎·古达玛尔:《土耳其的对外贸易特征》(土耳其),载土耳其《独立报》2015 年 1 月 26 日,第 3 版。

③ 《土耳其拟加大与拉美国家合作促进出口市场多元》,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2/8498814.html>, 登录时间:2016 年 4 月 7 日。

伴。^① 长期以来,土耳其也高度重视同日本的经贸关系。2015年11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土耳其,两国领导人表示将加强土日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核电站等大型能源项目方面开展合作。在历史上,土耳其和韩国的关系十分密切。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后,韩国政府曾向土耳其提供了约7,000万美元的援助。2004年,时任土国总理埃尔多安访问韩国,谋求两国深化双边贸易与投资,加强在信息产业、渔业、造船、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近年来,土韩在军事领域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尤其在“黑豹”主战坦克的生产方面,韩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援助,迄今土耳其已在该项目上投资了5亿美元。2015年11月14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出席二十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对土耳其进行了国事访问,土韩领导人表示除扩大经贸合作外,支持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总之,土耳其对包括非洲、拉美与亚洲地区在内的第三世界外交,体现了土耳其全方位拓展对外关系的外交思路,以及土耳其成为大国的雄心。

第四,积极同联合国等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全面合作,获取更广泛的国际资源与政治支持。土耳其外交注重同各类国际组织开展全面合作,尤其重视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合作。2000年至2010年间,土耳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为土耳其外交注入了强大动力。2014年,土耳其再次入选2015至2016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体现了土耳其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土耳其承诺,将努力把世界古都伊斯坦布尔建设成为联合国的事务中心。同时,土耳其还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了正式协议,将其办公地点落户伊斯坦布尔。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也将在伊斯坦布尔设立办事处。^② 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坦布尔将成为联合国机构办事处的聚集地之一,伊斯坦布尔也将成为继纽约之后联合国驻外机构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此外,外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数量已达127个,土耳其驻外代表机构的数量也从166个增加到了221个。^③ 在全球进步最显著的国家中,土耳其位列第七,该国已制定了未来三年将排名提升至前五行列的发展目标。^④

四、余论

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制度

^① 《土耳其总统今率百人商务团访华》,载《新民晚报》2015年7月29日,第A17版。

^② Tank Oğuzlu, “The ‘Arab Spring’ and the Rise of the 2.0 Version of Turkey’s ‘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 Policy,” p. 37.

^③ [土耳其]阿南德·加尔古勒:《土耳其对外机构现状》(土耳其),载土耳其《独立报》2014年12月18日,第3版。

^④ [土耳其]伊斯梅特·艾登努玛:《土耳其未来的战略愿景》(土耳其),载土耳其《自由报》2015年1月26日,第2版。

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然而,土耳其近年来的现代化转型仍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在政治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伊斯兰力量不仅在土耳其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民众日常生活也发挥着巨大的引导作用,导致土耳其国内的教俗矛盾突出。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的未遂军事政变,以及之后埃尔多安政权发动的政治“大清洗”,均对该国民主政治建设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经济上,土耳其产业结构单一,对欧美国家依赖过重,尤其未能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进行深度合作,这不仅在发展战略上是一种短视行为,也导致该国产业自主能力和独立性较弱。近年来,土耳其与中国经贸往来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仍显不足,经贸合作的空间仍有待进一步发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得到了土耳其方面的积极回应,但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及相关平台,创设基于互信、互利的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持续发展,将成为未来双方合作的重要议题。在外交上,由于地理位置、宗教和文化上与中东地区有着天然的联系,极易受中东地区乱局的影响。在地区层面,土耳其近年来因卷入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与邻国关系一度恶化,与周边国家“零问题”外交已濒于失败。在国际层面,2015年11月土击落俄战机事件、2016年7月土未遂军事政变等事件后导致土耳其同俄罗斯和美国关系的复杂多变,令土耳其陷入外交困境。长期以来,土耳其内政外交时常受制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导致土耳其在国际与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特别是土耳其成为地区霸主的政治野心也导致其与地区国家关系龃龉不断而一度跌入低谷。

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中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大国之一,土耳其是兼具历史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论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多么激烈,现代化转型之路仍是土耳其未来发展的主旋律。总之,未来土耳其将在遵循文明交往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现代化转型之路,构建民主体制相对成熟、军队建设回归法治、教俗兼容并蓄的社会,为持续发展和繁荣经济创造良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此外,对于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来说,最大的障碍与挑战集中体现为世俗与宗教的矛盾,尤其是代表世俗政治力量的军人集团与宗教集团,是长期影响土耳其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两股力量的较量升级必将导致社会危机频发。

(责任编辑:包澄章)